

天涯也有彎環月

陳芳明

——訪問蕭公權先生

「獻給學者、教師、詩人、人文學家蕭公權博士」，這句話題在一本書的扉頁。這本書便是蕭公權先生的朋友和學生合撰的一冊論文集「過渡與永恆：中國歷史與文化」：(*Transition and Permanence: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*) 一九七二年在香港出版。他們為了感謝蕭先生在治學方面給予的指導與幫助，在他退休之後，乃合力撰寫論文獻給他們的老師。書前說他是學者、教師，也是詩人和人文學家，這樣的稱呼並非是溢美，而是恰如其份的尊敬。在

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校園，凡是治社會學、政治學、人類學，尤其是治歷史的教授和學生，很少有人不知道「蕭教授」；即使到今天，他已退休了六年的時間，他認真的教學精神及謹慎的治學態度，仍是為同事與學生所推崇。

去年十一月十四日，華大歷史系的「中國討論會」(*China Colloquium*)，由王靖獻先生(即詩人葉珊)報告「陳寅恪的詩研究」，蕭公權先生也出席參加了。討論會一開始，主席即刻請蕭先生批評這篇

文章的得失，據說這已成爲慣例，無論校內校外的學者來此討論會報告，總是由他首先批評。他的發言謙虛而精闢，既能觸到文章的要點，同時也不致傷了作者的自尊，而且他語多詼諧，非常機智幽默，使整個會場顯得很緩和融洽。在討論過程中，一些美國教授起來發言之後，總要回頭看看蕭先生有沒有首肯，由這裏便可以看出他所受到尊重的程度。

蕭先生給人的印象是謙虛平實，一絲不苟。他今年已經七十八歲了，白髮皤皤，說話走路時却奕奕有神，他的身材瘦小，出門時總是穿戴得很整齊，頭上的一頂紳士帽，給人一種謹慎而穩重的感覺。我第一次去拜訪他時，事先和他約好時間。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兩點，我和內人瑞穗到達他家的門口，他已開好門在等候了。他的家就在華大校園的外邊不遠，那是住宅區，環境非常幽雅；門前的幾株綠竹，頗有中國的古意，這還是我到國外後，第一次看到竹影；雖然西雅圖下過了一場大雪，竹莖依然那麼堅挺，葉子還是那麼青翠。

進門後，蕭先生很親切地招呼着。他的客廳整理得很樸素乾淨，幾盆花栽放在窗口，細雨不斷打在玻

璃上，蕭先生坐在搖椅上，便開始敘說他的過去，靜靜的雨聲好像催趕着我們一起沉入他的回憶之中。

一、一生都在學習

蕭先生是江西泰和人，生於清光緒廿三年（一八九七）。他受過舊式的私塾教育，也接受最新的學校教育，他的時代正是中國處在新舊交替之際，所以他的性格也受到他的時代的影響，一方面他有傳統士大夫的那種收斂的修養，一方面他也擁有現代知識份子的開放的心靈，這一點反映在他的治學方面最爲清楚。

他在三十歲那年，即以「政治多元論」（Political Pluralism）一書，獲得西方政治學界的重視，但他並不因此而志得意滿；相反的，五十年來他堅持以「學習」的精神，時時處處去接受新的學問，他治學之所以如此廣博，便是建基於學習的原則。我向他請教一生治學的過程中，得益最多的是在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方？

他說：「治學這個『學』字，可以分成廣義、狹義兩方面來說。照儒家的意思，『學』是規矩矩的做人，就廣義來說，我是隨時隨地得到益處的。我生

在舊式的家庭，有許多益處是新家庭所沒有的。現在我回想起來，在兒童時代就得到很多益處；我生下來沒多久，母親就過世了，十幾歲時，父親也過世了，我幾乎可以說沒有享受到父母之愛。不過，我也很幸運，我有一位伯父，因他沒有兒子，就收養了我。我住在四川時，曾聽過一句話：『隔層肚皮隔層山』，意思是形容一般婦女的心理，對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總是比較不愛護，但是我的伯父母能够讓我和兩位堂姊妹一起讀書，想起來這是舊家庭的益處。舊家庭雖然不好，但也不盡是地獄，新家庭也未必就是天堂，就狹義的來說，我的伯父在我小時候，就請先生爲我和堂姊上課，打下了一點國學的基礎。到民國四年時，家裏的何世忠老師覺得沒有更多的東西教我們，所以就辭館。那時候求知慾很強，我向伯父請示可否到上海讀書，伯父很贊成，第二年就送我到上海去，我這位伯父實在很了不起。」

從他的語氣中，他對自己的伯父懷有無限的感激。他到上海之後，並沒有很順利進入中學，他先去投考聖約翰附屬中學，因英文成績不好，沒有上榜，他接着說：「後來我的堂兄叔玉，介紹一位在滬寧鐵路

做事的黃先生，替我補習英文。我又去考上海青年會附屬中學，這次果然考進去了，從那時起便集中精力專讀英文。我的國文因在私塾時期有了些基礎，可以不必花太多時間，有時還爲同學寫習作。」在青年會中學是他的關鍵時期，這段時期他不僅專攻於語文方面，而且也以插班的方式跳級唸書，縮短了他的中學時代。他的名字原來是篤平，後因插班時改名公權，他說：「我從前臨摹過柳公權的書法，改名時就用這個名字。」中學畢業後，即去報考清華學校，又順利考上。他在清華只有兩年的時間，便以公費送到美國求學了。他回憶說：「從兒童時代一直到老，隨處都有得益的地方，我覺得機會隨處都有，就看自己如何去體會利用。」

他自己承認來美國之後，也受到一個小挫折，當時他想學新聞，密蘇里大學的新聞系是很出色的，所以他到了這個學校，有志於「無冕之王」，他說：「新聞系有實習課程，必須去採訪新聞，在哥倫比亞那個小鎮能採訪的，只有到火車站，但是車站的人來來往往，無暇理會我這個『記者』，對我這個東方來的黃臉孔，似乎也沒有多大的興趣，在那一萬多人的小

鎮實在採訪不到新聞，第一年唸完就趕快轉到哲學系去了。」

在哲學系有兩位教授，一位是郝真教授（J. Hunson），但專攻形上學方面；一位是余賓教授（G. Sabine），專授社會及倫理哲學，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方面。他說：「我的政治思想就在這時候學習的，我認識政治多元論，也就在這時候。當時寫碩士論文便是有關多元國家的理論。」研究所畢業，余賓教授介紹他到康乃爾大學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。他以碩士論文為基礎，進一步探討政治多元論的內容，並評論其得失。蕭先生談到自己的博士論文時說：「康乃爾大學當時是美國唯心論的重鎮，我的興趣偏向倫理學方面，我不一定要成爲一個唯心論者，但接受它的訓練是不錯的，所以我選擇了這個學校。我受到狄理教授（F. Thilly）的重重，他是余賓的老師，他鼓勵我繼續擴充自己的碩士論文。當時政治系有位英國教授懷德林（G. Catlin），也教政治思想，雖然我有些論點和他不相符合，但他都能够容忍。我的博士論文『政治多元論』，便是由他介紹到英國出版，一個字都沒更改，列爲『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

書』，與其他八十多種名著並列，這是我生平最興奮的一件事，也可以說是我的運氣很好。」

「政治多元論」出版時，即受到政治學界的讚譽。此書是針對當時英國學者拉斯基（Harold J. Laski）所提出的多元政治理論，從唯心論的立場予以建設性的批評。拉斯基看完此書後，甚至寫評推薦，譽爲「最近五年內最好的一部政治學書籍」，蕭先生提到此事時說：「我把他批評得體無完膚，他却如此稱讚我，這樣的學者的風度，實在使人欽服。可惜我沒有機會與他見面，據說他的記憶力很好，演講時不帶隻字片紙，却能旁徵博引，甚至出自某書某頁，非常正確，這是一種 Photographic memory，過目不忘。」

蕭先生特別強調，「多元論給我開了眼界，它讓我知真理不是只有一個，我學哲學，可以說開拓了我的胸襟，心思也較爲仔細。」基於這個認識，他覺得各種學問都要去學習，他認爲做學問不應該關起門來，否則將過份狹隘。他以挖井做比喻，如果井口太寬或太窄，都不能挖得深，他提出中國的一句老話，即「由博反約」，一味求博，容易淪爲空泛，一味求

專，則流於空鑒。他說：「我除了學哲學之外，也學政治、音樂、文學、歷史……，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沒有錯，這樣做，more sound human being（才更像個人），不僅是人類學、社會學都學過，而且以此為治學根柢。」由此可知，他處處都在追求新的知識，藉此來豐富他本身的學問，並且也時時在學習，他自稱「到現在還是在學習」。他的學問予人的感覺並非是累積的，而是推陳出新，因此，他能够一方面治西洋政治哲學，一方面也能整理中國政治思想，這種成就乃是靠他長時期的學習精神所得，時時接受新的挑戰，才能恆久保持新鮮的學問。

二、教書與著書

蕭公權先生的教學生涯可分為兩個階段，第一時期是從民國十五年到民國三十八年，在大陸各大學執教；第二時期是從民國三十八年到民國五十七年，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，共計有四十二年的教學經驗。在兩種不同的地理文化背景的地方教書，自然有兩種不同的心得，然而他教的雖是不同的臉孔，他的認真態度則是不變的。他回憶到三十八年，第二次來美國擔任客座教授：「由於抗戰時期，我住在內陸

的四川，所以當時外界的許多新學問都被隔絕了，來到華大後，似乎什麼都要重新來。學校指定了一位高級研究生，教我一些新的研究方法，這是一種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，我覺得這個制度很好，讓我學習一些新的東西。」

談到教書，他自稱沒有什麼本事，只是比較認真，比較有敬業的精神。第一年剛來時，美國學生不瞭解他的背景，來選課的都是帶些嘗試的性質，他說：「第二年以後，學生自動來聽課的漸漸多起來，大概他們知道我是規矩矩的。我有一位同事曾說，他上課之前從不預備，我很佩服他，我知道自己不行，所以每次都需要預備，這樣才比較有條理。」蕭先生以謙虛的語氣說出自己的教學態度，說話中間一再提出「規矩矩」、「平平實實」，顯然，他教書的原則已經蘊含其中。在上課時，他絕不敷衍了事，充分利用每一分鐘為學生授課，惟恐耽誤了青年學生，這份執教的精神便是敬業的精神，對於這點他沒有絲毫慚愧。

在學校裏，他以公平對待學生，就我們所知，無論是中外的教授都希望自己能創出一個學派，看到比

較優秀的學生，就刻意拉到自己的門下。談到這點，蕭先生沒有特定那個是自己的得意學生，他只是說：「起初，沒有人跟我學做論文，後來有幾位來同我做，所以有些學生畢業了好多年，還和我通信，這就是我的得意學生了。我退休之後，有幾位學生特地撰寫論文，彙成一書，出版紀念論文集，這也算是我的得意學生，他們不但不忘記我，而且還過份誇張的表彰我。」從這段話，我們可以瞭解他不願舉出學生姓名的原因，他不願意居功，認為學生成名是他自己的努力，這種謙虛的態度實在使人欽佩。其實就我們所知，由蕭先生親自指導出來的學生，如今成名的實在不少，像現在在美國漢學界頗有影響力的年復禮教授（F. Mote），便是他來美國教書的早期學生，年復禮目前正在翻譯蕭先生的六冊中國政治思想史，準備介紹給西方的學術界。蕭先生只提到一位不得意的學生，他說：「有一位從香港來的中國學生，他的論文寫得還不錯，而且也以專書出版。前幾年，我對他很不高興，因為他去了大陸參觀，回來後大肆吹噓了一番，我寫信教訓他一頓，此後便沒有來往了。這樣的學生變成不得意了。」這是他身為教師應有的原則，他

認為什麼是應該做的，就積極去做，他也鼓勵去做。學生不守本份，他自然很不高興。一位辛苦了四十二年的教師，能够看重每一位學生，並不私心去栽培某些比較優秀的學生，真是做到了「有教無類」的境地，這種精神確實值得效法。

從他早期編的一部「中國政治思想選讀」來看，便可看出他教書的謹慎態度。這部選讀是他在清華大學授中國政治思想史的講義，他有計劃地從先秦到現代，凡有關政治思想的重要書籍或文章，選輯或摘錄，編成一部講義，讓學生能直接從第一手資料認識中國政治思想的真髓。這部講義對每一位思想家有簡略的介紹，扼要而得體，頗能勾劃出每位思想家的風貌。例如：選錄唐代韓愈的文章前面說：「儒家之人文主義，至愈頗有入於功利主義之趨勢。」選錄明代李贄的文章，則認為是「晚明自由思想之代表」，學生在研讀這部講義時，自然能瞭解到每位思想家的真精神，及其所居有的時代地位。即使到今天，這部講義也有它的價值，可以做為研究中國政治思想的入門書，現在華大的遠東圖書館仍藏有一部，彌足珍貴。遺憾的是當年的選輯工作，因遭七七事變發生而中輟，

所以現在只有六冊講義，輯至明代的張居正爲止。談到此部講義時，蕭先生說：「這是我從前在清華大學時發的講義，此書引用的資料很廣泛，由於有的古籍資料篇幅很長，必須予以摘錄。我的目的是要把中國政治思想濃縮成一本書，做爲敲門磚一樣，讓學生有興趣的，再去尋找原文來看。當時清華有印刷廠，所以就印成鉛印本。不過，清代部份還沒有完成，中日戰爭就爆發了。」談到這部講義的取材標準，他說：「我是從現代政治學的立場來看，只要是有意義有價值的思想，就收錄進去，一般泛泛的政論則不收。因爲思想是比較有系統有主張，政論則隨時間的不同，臨時發出的議論，同時這方面的資料太多，所以不收。其次，真正能反映整個時代和政治環境的思想，即使不一定是牽涉到實際的問題，像烏托邦之類的思想，我還是認爲有選輯的價值。」

正因爲他平時教書，把講義整理得很有系統，他正式撰寫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這部巨著時，自然得心應手，順理成章。這部書寫於抗戰時期，那時候他住在成都西郊外的一個農家，他借住在寬敞的廂房，白天在光華大學教課，空暇時才寫這部書。蕭先生說：

「我寫這本書的原則是，還每一個思想家的本來面目。這個做起來並不容易，但不能沒有這個志願。」他在這本書的「凡例」也說：「本書敘述各家思想，力守客觀之態度。偶有論評，亦意在辨明其歷史上之地位，非敢任意抑揚，臆斷得失。」顯然，他確實實要做到「探政治學之觀點，用歷史之方法」的工夫。我向他提起宋明這段思想寫得很精彩時，他說：「還說不上，我只是說了一些沒有人說過的，比較稀奇一點。此書出版時，繆鳳林先生說我能詳人之所略。略人之所詳，因以往治思想史的人，總是專注在先秦方面，我覺得唐宋以下也不能忽略。同時，一般寫政治思想史的，常常弄不清立場，有的看來像哲學史，有的則像社會思想史，我只是盡量從政治學的觀點來看政治思想。」

「中國政治思想史」在民國三十四年出版。出版後，即獲得中國學術界的重視，第二年立即再版，蕭先生並不因此而滿意，到現在他還是覺得：「沒有人寫出一部書就很滿意。我這本書不但文字方面需要修改，在詳略、論斷方面也應該修改。像寫康有爲那段，當時我能讀到康有爲的書實在有限，國內出版的康

著只有幾種而已，沒有出版的還很多。同時，康有為的政治立場始終是保皇的，在民國初年，他不但是聖人，還是叛逆，所以他的著作不易流傳，我那時只看見大同書等幾部，大概還有一些零碎的。要寫戊戌維新，非講康有為、梁啟超不可，梁的著作比較多，所以我寫他的思想較為滿意，當時我送到教育部審查，繆鳳林先生也說梁寫得很好。至於康有為的材料不夠，我不可能寫得很好，覺得自己不免誤解他的思想。」

民國三十八年來華盛頓大學，當時在遠東與俄國研究所(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)開課，就在這時候，他開始撰寫另一部英本巨著「中國鄉村」(Rural China)，蕭先生說：「這個題目是多年來遠東研究所想做的，但是很難找資料，我來到這裏，他們就要我來做，這是梅谷教授(Franz Michael)給我一個機會。我自己也覺得，老是在政治思想裏，總是翻不出身，就承擔了這份工作。後來我居然也一點一點的做出來，可以說沒有白費時間。」在撰寫此書的期間，他不僅參閱官方的資料，而且也採用了中國方志一百四十餘種，族譜二十

餘種。書成時，共約三十五萬言，一九六〇年出版，立刻列為政治學、人類學以及亞洲研究等課程的必讀書籍。同年，美國學術團體協會(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)以第三屆獎金贈給他，這是第一次頒給來自東方的學者，此項殊榮並沒有使他停止研究工作。

他寫完「中國鄉村」之後，又立即着手研究康有為，這是他長久以來的心願。他看到許多康有為遺著的微捲縮影，這些資料是梅谷教授到北平時，從康有為長女康同薇手中得到的。他讀了這些可貴的史料以後，更決心要修正以前對康有為的誤解，他說：「當時的看法，大多是從傳統的眼光來看，還不够客觀。我覺得非重寫不可。雖然資料並非百分之百都看到了，但至少也有百分之八、九十。後來，羅榮邦教授也來華大，他是康有為次女康同璧的兒子，即康有為的外孫，他也供給了我一些材料。至此，我才知道對康南海的認識不够，應該學習梁啟超『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』的精神。」

他的「康有為研究」，共陸續發表了五、六篇論文，約十二三萬字，非常受到注目，蕭先生說：「我

在前年，又把這些論文修改了，並添寫了一兩章，成爲一本專書。這本書的名字是：*A Modern Chinese and A New World—Kang Yu-wei: Reformer and Utopian*。主要是把他的維新運動和他的大同思想連接起來，這樣才能看出他整個思想的真貌。」這項研究，可以說完全修正他從前的看法，他自己在回憶錄「問學諫往錄」一書中也承認：「例如我說，『康氏以立憲爲保皇之手段，故其所號召者爲假民權。託孔子以爲變法之口實，故其所號召者爲假維新。』多看他的著作，細研他的思想之後，我發現這個論斷幾乎與真象恰相反背。現在我認爲這兩句話可以改爲『康氏以保皇爲立憲之手段，其所號召者爲漸進之真民主。謂孔子爲改制之聖人，其所企求者實爲制度與思想之一體維新。』」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，顯示蕭先生治學之嚴謹，他真正實踐了「過則勿憚改」的古訓，像這種精神在今日的學術界，可謂難能可貴。

三、詩詞與生活

蕭先生並非只是埋首於故紙堆中，他對於生活的情趣也頗能領略，他一生治學之所以能够活潑，富於

挑戰性，主要是得力於他開放的個性，而此性格之培養又來自他的生活。他在大陸教書時，雖然四處爲生活奔波，他也能够偷閒體會生活的情趣，這一點清楚地反映在他的詩詞上。現在他有兩冊詩詞，一是「迹園詩稿」，一是「畫夢詞」，這是他從大陸一直到異邦所留下來的上路歷程，從此二詩詞，可以看出他是如何的忙裏偷閒，如何呈露他的人生觀。我很欣賞他的一闋「卜算子」：

君愛月華清，却恨圓時少。若使蟾光夜夜圓，怎見圓時好？得句就君吟，有酒同君倒。若待月圓始醉歌，只怕愁多了。

他似乎不欣賞那種完美無缺的生活，而喜歡在缺憾的生活中體味生命的完整。他抱的是這種態度，所以在慌亂的戰火中，他也能够心安理得。來到美國以後，他的詩詞就寫得比較少了。他說：「最近比較不常寫，寫詩應該有新的環境，新的刺激；而且也要有朋友的鼓勵，像從前在大陸教書時，有吳雨僧、朱佩弦兩位先生的指導和品評。來美國後，生活比從前忙，沒有更多的閒情。前年，浦薛鳳先生來信告訴我，梁敬錚先生看了我的詩稿很高興。所以我就寄了一冊詩

集給他，我們還唱和了幾首。」說到這裏時，蕭先生顯得很高興的樣子，顯然，他從詩詞的寫作得到了不少的樂趣。

一般人總以為，他在家裏一定非常嚴肅拘謹，其實他是相當親切的。從詩詞裏，可以看到他對子女的關心，對妻子的愛護，反映出一個健康而充實的家庭生活。他說：「現在和我的女兒住在一起，可以由她幫我買菜。以前，總是由我替太太買菜。」在學術界那麼有成就的學者，在家庭裏能夠如此平凡的過生活，實在令人感動。

從詩詞中，也強烈地反映出他的鄉愁，他對故國的懷念可以說非常熾熱。那天，我向他請教一個問題，一個住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應該負起什麼責任？蕭先生說：「現在中國文化在大陸已被摧殘殆盡，所幸還有臺灣、香港保存了一些中國的傳統。在海外，如果你聽聽幾年來的美國漢學研究，他們常常因大膽假設，而胡說八道。我們在這裏應該有責任糾正他們，即使不能直接的反駁，也應該間接的指正，不要使一些謬誤的看法流傳開來，『禮失則求諸野』，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寫照。這幾年，他們也

許認為我還可靠，所以有問題就來和我商量，這樣就可以避免以訛傳訛了。」他的這段話可以說是語重心長。幾年來的「中國討論會」，他幾乎每次都參加了，主要的是要修正一些美國學者的看法。據說，有一次著名的漢學家 Arthur Wright 來此演講「隋文帝」，在討論時，大家請蕭先生發表意見，他說：「隋文帝修法典的第一條便是：不知道的事情不可以亂講。」引得全堂哄然大笑，然而這句話的背後，正在暗示美國治漢學者不應該信口開河。在華大校園，學生中流傳很廣的一個笑話，便是張仲禮先生來此演講他的「中國士紳」研究，列舉了許多量化的統計數字，後來蕭先生起來批評說：「這些統計數字看來就像穿比基尼泳裝的女郎一樣，該讓人知道的都讓人知道了，只是最重要的部份沒有讓人知道。」他的批評固然幽默，却是一針見血。他在這裏，可以說是美國漢學界的一個重要諍諫者，這種工作也正是保持中國傳統真面目的主要力量。

那天，離開他的屋子時，細雨斜打，手持他贈的兩冊詩詞集，覺得一股看不見的力量，擊打着我的胸懷。天涯固然茫茫，但像蕭公權先生的風範，在海外

，正像一輪明月，指示我們邁過崎嶇的道路，想到此，不覺也充滿了信心。

(六十四年一月十一日，西雅圖)

蕭公權先生專書著作目錄

- 1 *Political Pluralism,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* (London: 1927), 271 pp.
- 2 中國政治思想選讀(北平，國立清華大學，一九三七年)，六冊，七〇五頁。
- 3 *China's Contribution to World Peace* (Chungking and New York: 1945), 52 pp.
- 4 中國政治思想史(上海，商務印書館，一九四五年)兩冊，四五三頁；(臺北，中央文物供應社，一九五四年)，六冊，八八〇頁。
- 5 憲政與民主(上海，中國文化讀物社，一九四八年)，一三四頁。
- 6 *Rural China: Imperial Control in*

the Nineteenth Century (Seattle: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1960), 783 pp.

- 7 迹園文存(臺北，雲天圖書社，一九七〇年)，五六八頁。
 - 8 問學諫往錄(臺北，傳記文學社，一九七二年一月)，二二九頁。
 - 9 迹園詩稿(臺北，環宇出版社，一九七二年八月)。
 - 10 畫夢詞(香港，萬有圖書公司，一九七三年八月)。
 - 11 *A Modern Chinese and A New World — K'ang Yu-wei: Reformer and Utopian.* (此書將於一九七五年春天出版)。
- 〔後記〕：本文的題目取自蕭公權先生的「少年游」，原詞是：「他鄉久客已忘愁，歸計合成休。葉滿寒溪，冬餘殘臘，人在古梁州。天涯也有彎環月，斜照曲欄樓。屏上春山，梅邊香夢，酣枕少年游。」